

沉思

沈次农

乐曲早就拉得滚瓜烂熟，那行小字还在，但仍不知是什么意思。后来在上海听到电台播音员报“选自歌剧《泰伊斯》”时，才明白原来是法国作曲家的歌剧音乐。

就这一点信息，从不知到知，毛估估跨时将近十年。不是我笨，实在那时是一个资讯全无的时代。

后来唱片也有了，音乐会上也经常听到了。《沉思》于我，就像从小读的“床前明月光”，已经滚瓜烂熟，可以翻篇了。

岂料前不久第一次看歌剧电影《泰伊斯》，却忽然发现，原来从前对“沉思”的种种了解，仅是皮毛啊。

以前从唱片听音乐，觉得《沉思》旋律优美动人，把它当成一首唯美主义乐曲。也知道剧情是一位基督教教师，在拯救美艳妓女泰伊斯回归上帝过程中，反被美色所惑而不能自拔的故事。

《沉思》在歌剧中是以“间奏曲”的形式出现。间奏曲在歌剧中是幕与幕之间演奏的音乐，多给人有“间插”的意思，让剧情紧张的叙述来一个间隙，一个呼吸，在音乐上并不一定要与前后有呼应。

而《沉思》恰恰不是。
《沉思》是第二幕第一场与第二场中间的间奏曲，由乐队首席小提琴演奏。在这之前，《沉思》的旋律没有出现过。

如果在这个幕间听《沉思》，或许我们还是认为这只是一段优美音乐。在乐队首席拉完《沉思》全曲后，剧场内的听众会报以热烈掌声以示对独奏的赞美。但是当接下来舞台上继续沿着剧情进行下去的时候，我注意到，每当牧师与泰伊斯进行一次对话时，每当泰伊斯在天国与尘世之间反复挣扎犹豫时，“沉思”的旋律便响了起来。

当我们看着剧情听音乐时，我们很快便领悟了——那是她在纠结时想到了上帝。

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优美旋律。“沉思”旋律在这个时候，忽然升华为飘在天顶之上的遥远的召唤。那就是上帝在呼唤。音乐光辉灿烂，就像金光灿烂的阳光忽然照向舞台，照在泰伊斯身上。这时的配器已经不是小提琴独奏，而常常是整个乐队的全奏。而不管那些乐器，当“沉思”的主题出现，上帝的光芒就直射而下。一遍又一遍，“沉思”的主题几乎挤走了其他所有主题，成为下半部分的主旋律，一遍又一遍的重复，直至曲终。

我忽然明白：我平时听的都是唱片，是没有舞台表演，没有剧情进行的音乐。我听到的只是歌剧的伴奏部分，只是歌剧的一半内容。而现在我明明在音乐中听到了灿烂光辉。我竟然还以为自己对《沉思》早已了如指掌。

想起从前有一位法语教授前辈，在大半辈子学非所用后，终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、自己行将退休时，读到了小仲马的法语原著小说《茶花女》。老先生为法语原著中的优美文采赞叹不已，因身边无人能懂法语，自己内心的宝贵收获也就无法与人分享，却又按捺不住内心喜悦，以致我几次登门拜访时，每次都对我提及。

我并不懂法语，只是对他的欣喜表示理解。我们读到的《茶花女》，都是经过翻译的中文版。如果能读到傅雷的翻译，已经觉得很荣幸、至高无上了。而老先生却已经明白，读了法文原著，才真正理解为什么这是世界名著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也亏得他多次提及，才让我记忆至今。
有时候，一首曲子，一本书，对文化人的内心震撼，是很难让旁人理解的。按现在的说法，是很私密的。

京都与上海

月音

在书店闲逛的时候，出乎意料地发现井上章一《讨厌的京都》（「京都ざらい」）最近出了中文版（龚焯译，南海出版公司2021年3月版）。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，内中充满了出身京都市郊嵯峨的作者对正宗京都人的揶揄，以及作者对于自己被其他地区的日本人仍旧视作京都人的无奈。关于这一点无奈，作者讲得很明白：京都市区称洛中，市郊称洛外，按照洛中京都人的观点，住在洛外的绝不能算作真正的京都人。

整本书就在作者自称“出身嵯峨的乡下人”的自嘲和揶揄中，以一种特别的视角讲述洛中与洛外的纠结与日常。我作为在京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上海人，在书中居然读出了京都与上海之间某种一言难尽的相似之处，这大概完全出乎作者意料之外吧。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起来都缺少可比性，但在某些细节上，作为上海人，我却在京都体会到了奇妙的亲切感。

读空气与识相

在日常交谈之中，日本人的说话风格一般不喜欢把话说得非常直截了当，而是语气委婉，往往意思只表达一半，剩下的一半要根据语境由听者自己体会，这种把握氛围与语境的能力在日语中称为“读空气”（空気を読む）。但我不喜欢“读空气”这种无趣的直译，这个词如果翻译成上海话里的“识相”就特别精准，只要是上海人，或是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，一定能对“识相”这个词心领神会，直译的话反而不知所云，落了下乘。“不会读空气的人”（空気が読

めない人）就是日语里不识相、拎不清的意思。无论在日语里还是在上海话里，不识相都是相当不妙的评价，比比说成“傻”带来的心灵打击还要大。“傻”这个词（上海话说成“蠢”）在日语或者上海话里，有时根据双方关系的亲昵程度及语气，还可能附带一种“傻得可爱”的偏正面的感觉，算是给对方留有一点心理慰藉。但不识相、拎不清就是完全负面的，绝对不要心存幻想，这个评价一丝一毫正面肯定的语气都不会有，这在日语或者上海话里也是完全一致的。

而在日本人之中，公认说话风格最不直截了当的是京都人，这是因为京都作为日本的千年古都，依托于古老的历史和典雅的城市风格，京都人给人一种矜持的印象。日本流传着很多揶揄京都人的段子，几年前我刚到京都访学的时候，就有中国同学给我普及过。那位同学当时已经在京都生活学习了好几年，对我说：“京都人讲话风格婉转，一般人听不明白。比方说你去京都人家里做客，傍晚了人家说‘招待不周，晚饭一起吃茶泡饭吧’，你就不能傻傻地真的一起吃茶泡饭，而要告辞回家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”

我说：“这当然很明显是送客的意思了。上海话里也有类似的表达，比如做客的时候，主人家嘴上说着招待不周，但仍然端出几种菜肴，这就是有所准备，所谓的‘招待不周’只是口头自谦几句，实际行动是诚意留客的。但如果都说了只有泡饭，那就说明主人家毫无准备待客，再留下吃饭就识趣了。”茶泡饭是日本最简易的饭食，即是字面上的用茶汤泡饭，再就上一粒盐渍梅子以及调味的海苔等，跟上海人日常吃的泡饭就成菜异

曲同工。

这位同学当时一愣，感叹了一句：“果然是上海人啊。”她后来不服气，另外又举了几个关于京都人说话委婉的段子考我，毫无悬念地，都被我轻松化解。这位同学从此在“识相”这一点上对我很服气，并且觉得上海人大概都是识相方面的天才。实际上哪有什么识相的天才，这当然是生活环境所造就的。在我年幼的时候，城市大规模改造动迁之前，上海市区居住环境之狭小逼仄，在全国也是出名的，石库门房子里几家人共用厨房、卫生间的生活状态相当常见。而上海本身又是大都市，居住在陋巷的市民也见过世面，即使生活条件简陋，多少也会自带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的气质，维持一种派头和体面。

识相大约就是这样一种保持体面的距离感，正因为居住环境的窄小，反而言谈和人际交往之间的距离会拉大。很多人评价上海人冷漠，实际上用“冷漠”这个词并不准确，而是这种人际交往上的距离感的存在。一旦言行被认为“不识相”，这种距离感还会进一步拉大。上海人所谓的“识相”，确切地说，就是把握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距离，日语“读空气”的含义亦是如此。

坏石头与带锁的水龙头

在京都街道的转角处，有些人人家会安置一块石头，防止车辆撞上房屋，这种石头被称为いけず石，意思是坏石头。据《广辞苑》的释义，いけず带有使坏之意。我初到京都的时候，看到这种石头，以为只是日本街角的某种装饰，不以为奇。后来又去东京

住了一段时间，发现这种“坏石头”在其他地方几乎见不到，才知道这原来算是某种京都特色。日本的综艺节目里，常喜欢用日本各地的“地域黑”来制造话题，“坏石头”就被举作京都人不容易相处的例证，但实际上缘由并不如此。

之所以存在这种坏石头，在日本广泛流传的说法是，京都城市街道狭窄，车辆转弯时容易与街角的墙壁发生碰撞，车子能够当即开了就走，墙体被撞坏，蒙受损失的却是房主。“坏石头”遂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暗示：如果驾车转弯横冲直撞，这块挡在墙角前的石头能让车子也吃点苦头。说到底，“坏石头”之所以产生，与人品关系不大，街道狭窄、车子转弯不易才是主要原因。这也表现出高度发展、资源紧张的城市之中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繁复细节。

上海也有着容易给人留下负面印象的细节。大约2002年的时候，有位来自浙江的同学对上海的老洋房很感兴趣，我就带领同学到处参观。当时有的老洋房里仍保留着“七十二家房客”般的生活样貌，居住空间狭窄，厨卫是合用的，而且好几户人家的水龙头还上着锁。同学用相机对着上锁的水龙头换着角度拍照，说：“上海人真是太难相处了。”我当时也觉得这种水龙头上锁的行为有点丢上海人的面子。但到现在，面对同样的质疑，我不会再感到难堪。长安居大不易，在资源紧张的城市里，许多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的局促无奈。

熟悉感与疏离感

京都都是出境游的热门旅行目的地，中国图书市场上，以京都为主题的图书也为数不少。销量最高的多是游览图册，如Lonely Planet出版的系列，简明扼要地介绍景点、餐馆和旅馆。另一些则以介绍京都历史文化为主，如岩波书店出版的林屋辰三郎的《京都》，作者是京都出生的学者，曾任京都大学教授、京都博物馆馆长。小林丈广等人合著的《京都，流动的历史》，是一部介绍京都名胜掌故的作品，这些书籍都已经有了中文版，适合想要进一步了解日本历史、文化的读者。

井上章一《讨厌的京都》与这些书籍不同，作者自述：“对京都人的高傲自大，我总是愤愤不平，气愤的结果就是奋笔写下这本书。”由于作者出生于洛外，不被视为真正的京都人，所以这本书的视角就带有一种相互矛盾的意趣：作者在京都长大成人，对京都有足够的熟悉，能够信手拈来一些“此中人”“不足为外人道”的事例自嘲；又因为洛外的出身，被洛中所轻视，书写角度带有独特的疏离感。作者反复在书中表达：“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京都人，可我还是无法全心全意地喜欢这个城市。”

很有趣的是，即使作者反复说明不喜欢京都，我读完这本书的时候，还是感受到他对京都的爱。作者这种隐藏在批评表象之下的、口非心是、极其无奈的对于京都的爱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作为一名读者，我并没有因为读了这本书而对京都产生负面印象，反而觉得京都这座城市在井上章一的笔下有鲜明的生活气息，充满人情世故的趣味。

说回上海吧，国内关于上海的书籍也很多，上海本地出生的作者笔下多少带有一点对于乡邦的回护，又或者有一种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偏差；非上海出生的作者，对于上海人心态的把握和了解又存在误区。很期待书写上海的作家，也能够在对上海的熟悉感与疏离感之间，达到微妙平衡。

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割的。霍金《时间简史》开篇如此发问：“宇宙从何而来，又将向何处去？宇宙有开端吗？如果有，在这开端之前发生了什么？时间的本质是什么？它会有终结吗？”同步思考时间和空间，这点中西方文化是一致的。中国人把四方上下也就是无限的空间叫“宇”，把古往今来也就是无限的时间叫“宙”。有人说，相比于容易注意到的空间，时间才是最大的科学，也是最大的奥秘。中国人对时间的感悟，总是把自己或者说把人置身于其中。因为有人置身其中，冷峻的时间便成了光阴，氤氲着人文的光辉。

“时”原本是没有“间”的。就我们有限的感知来说，时间是线性的、无限的、均匀的、单向的。线性的、无限的、均匀的、单向的时间，如果没有进行区分，就没有办法生产和生活。饮食男女是人的本能，男女如果不是即时发生“本能”之事，也必须给“时”确定一个“间”，越小的区间越能使行为精确地达到预期的目标。这样就必须通过观察找出规律而发现时之“间”。

太阳一升一降，月亮一盈一亏，是人们最容易观察到的“时”之“间”，是“日”“月”，这种日月推移，在明亮与阴暗、白昼与黑夜中的轮换，就是时间。时间在中国人那里，就不再是单纯的时间，而是光阴。

“光阴”二字是古诗文中最美的字眼。唐代传奇小说《古镜记》“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，光阴所及，如冰著体，冷彻肺腑”，这里的“光阴”是指月亮的光芒、光亮，既是“光”，也暗含“阴”。“光阴”浸润了中国人对时间的理解、利用、珍惜和感叹。
南朝江淹《别赋》“明月白露，光

中国人的光阴

韩可胜

阴往来。与子之别，思心徘徊，把光阴与恋人离别结合在一起；北齐颜之推《颜氏家训》“光阴可惜，譬诸流水，当博览机要，以济功业”，将光阴与建功立业联系在一起；唐代李白《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》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”，将光阴与代际更替联系在一起；唐代韩偓《青春》“光阴负我难相偶，情绪牵人不自由”，将光阴与孤独相思联系在一起；唐代王贞白《白鹿洞》“读书不觉已春深，一寸光阴一寸金”，将光阴与书院苦读联系在一起；宋代苏轼《马行灯记当年》，将光阴与怀旧感伤联系在一起……至此，“光阴”的人文含义就较为齐备了。

到了明代，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“玄德回新野之后，光阴荏苒，又是新春”；李贽《复邓石阳》“年来每深叹憾，光阴去矣，而一官三十余年，未尝分毫为国出力，徒窃俸余以自润”；冯梦龙《喻世明言》“光阴荏苒，不觉又推过了二年”等等，其次都不出唐宋，并且趋于平民化，遂产生了一句俗语：“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”

“光阴”也可以解释为“日”“月”。茫茫苍穹中，日、月是两颗最璀璨的星体。中国人理解的“日”“月”，既是天上自然形态的

“日”和“月”，也是文化、心理、精神中的“日”和“月”。

譬如“月”。西方历法中的“月”，把一个太阳年除以十二，每个月的起点和终点，每个月的长度，与天上那一轮明月，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关系。而中国传统历法中的“月”，高度尊重自然，它的划分严格依据天上那轮明月。初一，叫“朔”，意思是月亮从消失中“苏醒”过来，是月相最小的时候；“晦”是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，月亮到了“尽头”的意思。“望”则是月满的那天，处于一月之正中。“朔”“望”“晦”都代表了月相。农历的日子一定是在“朔——上弦月——望——下弦月——晦”中循环往复，一个经过训练的人，能通过天上的月相而准确判断出农历的日子。

此月是自然的月，也是人文的月。中国人对月充满了温情，最美的诗词都献给了月。写月的诗词，可以是豪放派，壮阔如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”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”；可以是婉约派，妩媚如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“燕子楼中霜月夜，秋来只为一双人”。月可以寄托一切美好的感情，包括乡情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、爱情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、亲情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、友情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”，以及那种不怎么

得清的感情“夜月一帘幽梦，春风十里柔情”。

中国的节日中，与月相关的节日最执着、最深情，包括正月十五的元宵节（上元节），七月十五的中元节，八月十五的中秋节，十月十五的下元节。西方学者甚至把中国人称为崇拜月亮的民族——似乎有点道理，注意到了中西方对“月”的感情差异，但其实是 inaccurate 的。中国人对所有的时“间”，都充盈了丰沛的人文情怀。

再譬如节气。“节气”是对光阴所做的进一步区分。首先，节气是自然，是对一个太阳年的二十四等分。这与西方的星座是对一个太阳年的十二等分，科学上的道理是一致的。西方的历法是阳历，中国的节气也是阳历——依据的是太阳，而不是月亮。其次，节气还是人文，从节气的命名，到衍生的节气文化，都能体现时之“间”与中国人的高度统一。

在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，申报方是这样表述的：“‘二十四节气’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，认知一年中时令、气候、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。”作为知识体系，它是科学；作为社会实践，它指导着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，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生产生活的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

重要组成部分。

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各有着眼点。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，是四季的开始，把一年分成了四等分。夏至、冬至、春分、秋分，是太阳高度变化的转折点。小暑、大暑、处暑、白露、寒露、霜降、小寒、大寒，反映气温的变化。雨水、谷雨、小雪、大雪，反映降雨、降雪的时间和强度。惊蛰、清明，反映自然界的动物和环境的变化。小满、芒种，反映农作物的成熟情况。

尽管不知道太阳和地球公转、自转的关系，但是早在2200年前，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就通过观测日影，完整地测算出每个节气的准确时间点。中国人测节气，不是探讨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。节气于中国人，首先是农时，农耕社会的最高法则。顺应农时，才能保产高产，所谓“民以食为天”，也是“民以天为食”。这恐怕是中国人口众多的根本原因。通过农耕，节气就从自然走进了生活，先物质，而后精神。

中国人相信“天人合一”，自然界和人是相通和相对应的。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的身体、命运之间，有着复杂而隐约的相关性。这是中国人养生的逻辑起点，春种夏长、秋收冬藏，讲的是自然，也是人。甚至，这也是中国人命相学的逻辑起点。众所周知，中国人的属相不是从元旦开始的，严格来讲，也不是从春节开始的，而是从二十四节气的“立春”开始。

在节气申遗成功后，新华社评论说：节气“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依然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规律和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理念，彰显出中国人对宇宙和自然界认知的独特性及其实践活动的丰富性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创造力，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”。——所言甚是。



笔会

“文汇报”
微信公众号